

## (四) 政教關係之部

梁潔芬修女撰寫



自從在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教會比從前更為政治化。教會內各領袖，例如：公教青年聯會及天主教大專聯會的神師，和天主教大眾傳播處主任等，變得開口敢言，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例如：在八八直選、基本法及其他有關問題上，率先表態。

雖然這些教會領袖聲稱他們以私人身份參與這些事件，但社會眾人皆心知肚明，認為這是天主教會的參與，而不是個人的行動。

有時，教會領袖與社會活動份子及非天主教壓力團體聯成一條陣線，針對某一事件採取聯合行動。他們的索求及抨擊有時集中在不久淡出的香港政府身上，有時也牽涉未來要統治香港的中國政府及其對香港的政策上。所以漸漸地天主教會中的活躍進步分子已成為香港的壓力團體之一。今日會使香港

尷尬異常，來日使中國同樣的尷尬。但是，如果教會的機構在九七年後，仍然會如今日一般繼續接受特區政府的資助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在一龐大的壓力下去採取妥協路線，因為若有資助，接受資助那方一定要和付款者合作。

雖然，香港的全體天主教徒中以上述方法去爭取正義和平的不超過一成，但相反，很多天主教徒，（包括很多在高層上任重職的天主教會領袖）大多與這些社會事件沾不上邊。香港教會最高領導人雖然會毅然拒絕直接牽入這些事件中，以免損害他和政府的和諧關係。但另一方面，他卻不禁止屬下各人的參予。香港胡振中樞機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制止教會內的人去玩這種社會政治遊戲。這現象顯示了他間接地讓天主教徒為打擊政治罪惡而參予社會——政治運動。

## 【一九九七年後的天主教會 有關倫理及教義上的難題】

在香港天主教教區內，政教關係的發展要看中國對教會的容納程度而定，多繫於天主教會是否繼續堅持要扮演先知的角色，以正義和平之名去批判政府。一方面，天主教會的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在香港社會上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日後一些國家政策與教會的教導不太吻合時，教會是否準備作妥協呢？若果教會準備妥協的話，在一些敏感的問題前，例如：墮胎，學習馬列思想，以及教會與羅馬脫離關係而實行三自等問題上，教會在甚麼地方劃出它的底線呢？雖然這些問題的尖銳部份可能在五十年後才會完形畢露，但香港的教會總要準備面對「一國兩制」的五十年過去後的香港社會。

## 【教會在現代化上扮演的角色】

在中國政府的心目中，天主教會既然是個社會性組織，它就責無旁貸地應參與四化工作？在這個中國人非常關心的四化問題上，香港天主教徒有甚麼責任呢？它可在這方面作甚麼貢獻呢？教宗曾呼籲海外國籍信徒（包括香港的信徒）充當橋樑重任，好使藉

著此橋樑的運作，中國天主教會能與普世教會復合。香港教會能建起怎樣的橋樑呢？香港可以作甚麼貢獻去協助中國地方教會，使它能擴大自己對現代化的貢獻？

即使香港教會與中國政府友好交往，誠意合作，藉此向對方表示教宗一九八一年在馬尼拉所說的「一個好的基督徒也是一個好的公民」的訓言能付諸實行，但當天主教徒碰到上述社會和宗教問題（例如家庭計劃問題）時，我們希望他成為好基督徒而堅持教會的指導呢？抑或他要成為好公民，而採取國家規定的節育方法呢？

整體說來，中國無論在外交事務上或在處理內部問題上，都較以前老練圓滑，對待香港人猶加謹慎。事實顯示出，若北京政府以粗暴的手法去對付港人，只有加快人才外流的速度，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不會再以五十年代對付大陸教會的手法去加速政教的衝突，但這並不表示對那些因宗教信仰而拒受政府要求的天主教徒不會以巧妙的方法施加壓力。那麼，教會領袖有甚麼方法去協助草根階層的信徒去應付因堅持信仰而要面對的社會歧視的間接壓力呢？針對上述問題而設計一個合適的平信徒培育計劃也許是良方妙策。



部份講者在研討會上發言